“我是敬一丹”

□铁　扬

大约是上世纪的1991年，我送一位作家去保定车站会敬一丹，那时我住保定。他们有约赴湖北还是湖南做采访活动。当时我们尚无自己的车，而我们的城市公交也欠发达，当时，所谓的“送”，无非是“送者”骑一辆自行车，“被送者”坐上自行车的后衣架，便是送与被送的形式了。

当时敬一丹已入职中央电视台，像是在主持“经济半小时”还是“东方时空”，不算“大腕”。但她那有着亲和力的面孔和新鲜的主持风格，已经被人所熟悉。他们所乘的车是当时被称作“特快”的绿皮火车。敬一丹在北京上车，我送的这位从保定上车，他们约定在保定车站会面。已是晚间，因事先不知敬一丹所乘车厢，我们在昏暗的站台上随便一个地方站下来。少时，列车喘着气，夹带着一身烟草味儿进站停住。就见一位女士从车上跑下，东张西望在找人，这正是敬一丹。这天，她穿一件白色夹克衫、牛仔裤，给一座昏暗的老车站，增添了不少清新。二人见面，待要上车时，敬一丹突然又转过身来问我：“是铁老师吧？”我说我是铁扬。“我是敬一丹，以后有事找我吧。”然后又悄悄对我说，“咱们有摄制组。”她说得清淡恳切。敬一丹认出了我，也深知我的画家身份。我大概只说了一声谢谢，敬一丹就消失在上车的人群中。

不久，他们的采访编成了一个叫《红花草》的电视片，内容是讲一位山区小学老师的故事。形式像电视散文，播出后有不小反响，还曾获几个奖项。

1994年，我在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我的个人画展。我想到敬一丹，请她参加开幕式，还想到她对我说过的“咱们有摄制组”。一个首次在中国美术馆办展的画家，有了开幕式，若再有个摄制组陪伴“捧场”也算豪华了吧。我有些冒昧地跟敬一丹打了个电话介绍了我的展事，希望她能出席，并帮我留些资料。她热情坦率地答应下来。

开幕那天，敬一丹来了，她的摄制组也来了。根据她提前拟定好的提纲，超前地为我拍了许多珍贵资料，观众也热烈地簇拥着这位电视“名人”，为我的展览增添了许多气派和风光。



作者（右）和敬一丹在中国美术馆



敬一丹采访画家潘世勋（中）

之后我和敬一丹常有简短的或文字或电话交流。我还借助她所处位置，向她反映过属于“社会”的问题。比如在城市建设中怎样保护好有价值的老树；高雅艺术怎样进入大众的视野；怎样规范城市中散漫无序的菜市场；某些品牌的家电质量低下给用户带来麻烦……凡此，每条内容都会成为一丹当天的主持内容，所涉问题也在迅速改进着。

当我再次见到敬一丹时已是本世纪的2011年。我第二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我的个人画展。这次我像“得寸进尺”一样拟请敬一丹主持开幕式。在电话里我们做了沟通，她痛快地答应下来。于是我把展览细节、参展领导和嘉宾名单寄她，只等开幕式那天敬一丹到场了。

但，我是地方画家，一切活动也包括拟请主持人的事，都向一位领导我的地方领导做了汇报，领导对主持人一事也未加可否。或许他以为那只是我的梦想，请一位电视名人做主持不会成为现实，但我以为已得到了领导的首肯。

开幕式在上午10时举行，9点前我即赶到中国美术馆，发现敬一丹早已在贵宾室等我了。我们再次将开幕议程确认。这时一位“我方”同志进门让我“出来一下”，他是那位领导的“秘书”。他告诉我领导要见我，我随他进入另一房间。这位领导指名道姓地对我说：“铁扬，你还想不想在我省工作？”我被一头污水浇得昏昏沉沉说：“想啊。”他又问我：“你请了敬一丹是吧？”我回答说：“是。”他说：“是，事儿不能这么办。你是我们的人，主持人应该是我们。”

我们是谁？“我们”就是维系你生存的那一方天地吧。

我磕绊着说：“敬一丹已经来了。”“来了，赶快请人回去。”他说。看来事情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我不知怎么走回贵宾室的。只见敬一丹还在翻动主持词，我六神无主地把刚才发生的事如实告诉了敬一丹。一丹把手中的主持词合起来，沉思片刻说：“铁老师，这样好，这样对你好。”这时贵宾们已经陆续走进来，敬一丹却消失了。开幕式改由“我们的人”主持。主持人面对前来祝贺的嘉宾，海阔天空地说了我不少好话。该我致辞时，我却六神无主地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在寻找敬一丹。终于发现了她的存在，原来她坐在贵宾席最后一排最边上一个椅子上，用平和的目光注视着我。

开幕式结束后，当我不知如何对待她时，她朝我跑过来说了她的拍摄计划，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我注意到她身后的摄制组。她提醒我应该采访几位老艺术家，这比只关注一些热闹场面更有价值。于是在展厅，我请了我的老师冯法祀、张重庆、齐牧冬以及韩美林等。我们一起做着交流，她又对他们做了单独采访。

日月荏苒，转眼已到了2020年，又遇到我的艺术活动。这次“事关重大”，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美术馆要举行开幕式，我又想到了敬一丹，请她做主持人。依我对敬一丹的了解，她是不“计前仇”的。我拨通了她的手机，像以前一样，她总是先说：“我是敬一丹。”我向她说明我打电话的目的，她迟疑了一下说：“铁老师，这次可能会让你失望。”原来她陪母亲久住医院，最近母亲刚离她而去。久住？有多久，那是一年半的时间，是540天。540天的无奈，540天的期盼，那日子是难熬的。但她作为母亲的女儿，她担起了母亲最后的日子。在电话里，她还对我讲了一些侍奉母亲时的细节，那细节听来让人动容。她以一颗纯净的爱心，送走了一位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母亲。目前她还没有从那难耐无助的氛围中走出来。

我理解敬一丹，劝她节哀保重，还说了一些可说可不说的话。人在不知所措时，大概都会说一些可说可不说的话吧。

不久，敬一丹寄来一本书，书名为《床前明月光》，详细记载了她陪伴母亲的那540天。文字是委婉、纯净的。她说：“妈妈不在了，我站在了夕阳里。在这儿，我一眼就看到了夜，看到月光，看到生命的终点。”

她看到母亲伴着月光而去。

敬一丹是眷恋月光的，她觉得那540天也是伴着月光的。

我把我的一本散文集《母亲的大碗》寄赠给敬一丹。其中有一篇写了我母亲和她的一只大碗的故事。一只粗瓷大碗，从不被家人注意，只待她生日的那天，她捧出了它，盛上杂着瓜菜的粥，自己默默喝起来。这时院子里一棵杏树正开着花。

敬一丹接到书，在电话里对我说：“铁老师，原来我们都有一位值得敬重的母亲。”

哪知，一丹也离我们而去，她只为我们留下一句话：“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

走过，是她对这可爱世界的眷恋。

走过，是她享受过这世界。

她走了，走得仓促，连世界对她都措手不及。

她走着，一定也有月光伴她一路。

长征，遵义，伟大的信仰

□张小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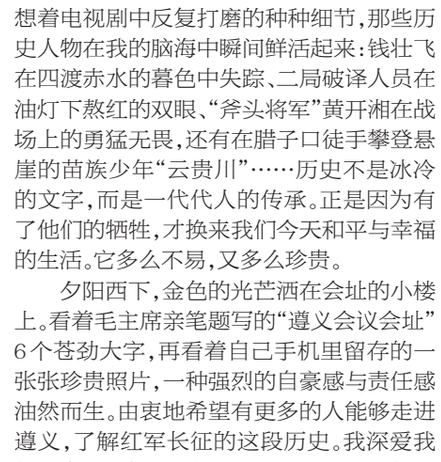
2026年的10月，注定让我永远难忘。北京秋意渐浓，我的内心却因为历史的激荡而久久不能平静。今年正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名责任编辑，我很荣幸参与了60集大型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的播出修改工作。在日复一日的备播期间，作为一名党员，每当审看那一段段记录着血与火的镜头时，心中对革命先辈们的壮举，对红军曾经洒下的鲜血以及对那伟大的转折时刻，越来越肃然起敬。

屏幕上的画面虽然经过艺术的精心雕琢，但仅靠光影的呈现，依然难以完全满足我的求知欲与探索欲，以及对那段真实历史的极度渴望。为了能够亲身感受历史的温度，我借着周末，连夜飞赴贵州，来到了贵阳，来到了遵义。我希望让自己走一走九十多年前先辈们用双脚丈量过的路，去寻找那份支撑他们走完二万五千里的伟大信仰。

我前往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观看了与长征有关的沉浸式演出。作为一名有着二十多年从业经验的影视文化工作者，我对声光电的运用本已十分熟悉，但演出中融合的现代科技依然带给我极大的震撼。历史的呈现是如此真实，以至于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一个半小时的演出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与波澜壮阔全面展现在眼前，令人意犹未尽。尤其是看到《伟大转折》时，全维度影画场馆、飞行屏与舞美帷幕矩阵，将汹涌的赤水河、险峻的金沙江逼真地推到我的眼前。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了当年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展露出的英勇与无畏。

带着在贵阳受到的震撼，我马不停蹄地赶往遵义会议纪念馆。令人遗憾的是，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现在的会址二层不让观众入内参观。我无法直接看到那间只有20多平方米、当年却坐下了20个人的会议小屋——尽管斯室拥挤，但他们有着心怀天下人民的磅礴气魄，令人神往。

虽然小楼不能上去，但纪念馆内丰富的主题内容、珍贵的照片细节，以及对长征全局的铺排陈设，让我感受到了真实史料所带来的巨大震撼。展柜里，红军长征途中用过的汉阳造步枪、缺口的碗、破旧的灯、磨烂的草鞋、打满补丁的衣服，以及强渡乌江时用过的木板，每一件都带着当年的痕迹。看着这些物件，脑海中就浮现出红军战士的动人形象。



遵义会议会址的珍贵图片、电报的原件、战士们脸上洋溢着纯粹笑容的合影，还有那精心绘制的长征路线图和穿越雪山的伤亡统计表……这些全面、详细的陈列，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穿越到那段赤诚岁月的大门。我似乎触摸到了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历史，也开始读懂了什么是不可动摇的信仰。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故事进行了全景式的完整呈现。看着展馆中的史料图片，回想着电视剧中反复打磨的种种细节，那些历史人物在我的脑海中瞬间鲜活起来：钱壮飞在四渡赤水的暮色中失踪、二局破译人员在油灯下熬红的双眼、“斧头将军”黄开湘在战场上的勇猛无畏，还有在腊子口徒手攀登悬崖的苗族少年“云贵川”……历史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代代人的传承。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和平与幸福的生活。它多么不易，又多么珍贵。

夕阳西下，金色的光芒洒在会址的小楼上。看着毛主席亲笔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6个苍劲大字，再看着自己手机里留存的一张张珍贵照片，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与责任感油然而生。由衷地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走进遵义，了解红军长征的这段历史。我深爱我的国家，爱着革命先辈们留给我们后人的这段历史，爱着这片土地留下的一个个令人动容的故事。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影视文化工作者，我很希望能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更好地宣传这段历史，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



遵义会议会址

热土汤池

□金志伟

在小镇人的心目中，汤池，一直是个滚烫的地名。“天上瑶池，人间汤池。”这不仅是一句宣传语，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这个地处庐江的家乡的热爱与欢喜。汤池是一块热土，这不仅仅因为这里有地热和温泉，更因为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许多血与火的故事。

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在汤池召开军事会议，正式宣布江北指挥部成立。

指挥部设在严家祠堂。这是一座徽派四合院。20世纪90年代，我参与创作《美丽的汤池》一书时，采访过几位80多岁的老人。这些老人对江北指挥部的事情记忆犹新。其中一位严姓老人还记得当年的很多细节。他说指挥部的将军们都很和蔼可亲，他见过罗炳辉将军和张云逸将军。罗炳辉将军身材高大魁梧；张云逸将军个子不高，但骑在高头大马上也很威武。有一次，他见张云逸将军的马拴在一棵枣树下，就想摸马，但又怕马踢他。这时，一位警卫员问他：“想骑？”他胆怯地点点头。于是，警卫员把他抱上马鞍。马比牛高，过去他只骑过牛，那是他平生唯一一次骑马。虽然马鞍没焐热就下来了，但这种骑在马背上的感觉，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如今，在江北指挥部旧址基础上兴建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是小镇的地标式建筑。它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之一。2016年12月，它还入选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汤池松园虽然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在汤池这片热土上却留下了许多温暖的记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大批热血青年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汤池一地就有500多人参加了新四军。在汤池，许多老人还记得曾经流行的歌谣：“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新四军，爱人民，军民团结一家人。”

热血青年钱良胜就是在这首歌谣的感召下参加新四军的。2023年，经过改造提升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纪念馆恢复开放。展柜里，陈列着十多本钱良胜日记。1939年，得知江北指挥部在庐江汤池成立，正在安庆一中读书的钱良胜找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要求参加新四军。参军后，他被编入第四支队三营九连当文化教员。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钱良胜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几年间，他一共记了40本。1985年，钱良胜得知安徽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正在征集党史资料，便将其中22本日记捐出。党史专家认为，这些日记对研究新四军第四支队早期军事活动轨迹，以及新四军基层连队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宣传、卫生等工作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新四军皖东敌后抗战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2023年10月初，我陪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来到庐江二中教师公寓，从钱良胜的后人手中又接收了剩余的18本日记。这些日记，都是用不同的纸张手工订制的，但清一色的蝇头小楷真实地还原了一个滚烫的年代。

这是一份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是火红岁月的真实记录。从它的字里行间，我们能读到一个战士的初心，还能读到老一辈革命者滚烫的青春誓言。

在汤池，我还听到了史沫特莱的故事。1938年10月，史沫特莱先到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次年她访问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通过一年多的深入采访，她掌握了大量的素材，这些素材为她创作《中国的战歌》一书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941年，史沫特莱返回美国，在美国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1943年，《中国的战歌》一书正式出版发行。在这本书的扉页上，作者写了这样一句话：“献给中国的士兵们，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先驱，他们穷苦却无比光荣。”《中国的战歌》是那个岁月里最炽热的歌，也是一位国际友人对一个时代的滚烫记录。值得自豪的是，这些镌刻在史册里的文字，有一页属于汤池。